

BINWEI YUYAN YOUSHENG YUDANG JIANSHE YANJIU

#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研究

BUILDING ENDANGERED LANGUAGE AUDIO ARCHIVES

范俊军 编著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研究

BINWEI YUYAN YOUSHENG YUDANG JIANSHE YANJIU

#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研究

BUILDING ENDANGERED LANGUAGE AUDIO ARCHIVES

范俊军 编著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研究 / 范俊军编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5

(暨南大学高水平大学建设资金资助出版)

ISBN 978-7-218-12611-1

I. ①濒… II. ①范… III. ①汉语—资源保护—中国—研究 IV. ①H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7215 号

BINWEI YUYAN YOUSHENG YUDANG JIANSHE YANJIU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研究

范俊军 编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骆妮 林小玲

封面设计: 李翼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66 千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12

#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濒危和濒危语言研究 .....	1
第一节 语言濒危的基本理论问题 .....	1
第二节 从语言学描写到多媒体记录建档 .....	17
第三节 教科文组织的两份文件 .....	20
第二章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基本问题 .....	74
第一节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基本原则 .....	74
第二节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内容资源 .....	77
第三节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权益问题 .....	90
第三章 语言数字遗产与濒危语言有声语档 .....	94
第一节 语言数字遗产的定义和范围 .....	94
第二节 濒危语言遗存语料的保护和利用 .....	98
第三节 从语言数字遗产看濒危语言有声语档保护 .....	101
第四章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规则规范 .....	106
第一节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元数据规范 .....	107
第二节 中国语言和方言名称及代码研制 .....	122
第三节 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名称及代码表 .....	134
第四节 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名单 .....	154
第五节 中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数据规则 .....	171
第六节 中国濒危语言自然话语转写规则 .....	192
第七节 濒危语言文本语料标注规则 .....	205

第五章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实践操作 .....	216
第一节 采集语料的困难及解决途径 .....	216
第二节 采录有声语料的操作规程 .....	219
第三节 录音机和录音软件使用 .....	222
第四节 有声语料的处理和转写标注 .....	234
第五节 EXMARaLDA 和 ELAN 转写软件 .....	237
第六节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创建流程 .....	264
第六章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技术实现 .....	291
第一节 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实体形态 .....	291
第二节 字词句有声语料采录软件设计 .....	295
第三节 语档网页包自动生成技术框架 .....	313
第四节 濒危语言资源管理 XML 元素集 .....	321
参考文献 .....	330
附录：濒危语言（方言）有声语档网页样本 .....	334

# 第一章 语言濒危和濒危语言研究

## 第一节 语言濒危的基本理论问题

### 一、国内外对语言濒危关注的历史回顾

国际上对语言濒危问题的正式关注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 1991 年《科学》杂志 250 卷发表 *Endangered Languages* (《濒危语言》)一文为标志。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当年定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5 年和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了两次濒危语言国际会议,1997 年第 29 届会议批准了《世界语言报告》项目,2001 年启动了《宣布人类口传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计划,同年 11 月召开的第 31 次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行动计划建议案》。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成立了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负责起草有关濒危语言保护和抢救的文件和计划,并于 2003 年 3 月在巴黎总部召开了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通过了专家组提交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该报告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同年,随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2 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将作为口传文学载体的语言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正式发布《世界濒危语言地图》电子版,向全世界公布了全球语言濒危的基本信息。从 1995 年到 2003 年间,濒危语

言的调查记录、描写和分析研究，迅速成了语言学研究的国际潮流和热点。

我国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相对略滞后于欧美。20世纪90年代国内民族学界谈及语言濒危时还存有忌讳，因为我国语言濒危比较突出的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民族问题是敏感话题，“濒危”一词往往容易联想物种灭绝和生态破坏，谈到少数民族语言濒危似乎有点影射大汉族语言文化造成了少数民族语言濒危。1992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15届世界语言学大会就有一个濒危语言专题研讨会。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该次大会，会上我国代表就曾表明中国不存在濒危语言。但到了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随着全球化进程，我国语言学界逐渐与国际语言学界取得了共识。教育部1998年批准立项的人文社科博士点基金项目“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就明确以“濒危语言”冠名。2000年黄行教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著作出版，最早引进了“语言活力”概念。同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正式提出濒危语言问题，会上虽然有学者对“语言濒危”说法提出异议，但此后不少语言学者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汉语濒危方言问题发表了看法。随着国际上许多国家政府对文化多样性问题广泛重视，语言濒危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很快得到了国内语言学界、文化学界、政府乃至公众的认识、理解和接受。从那时起，我国民族语言学教师和研究生开始进行濒危语言个案调查，濒危语言研究迅速成为语言学的热门领域并一直持续至今。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就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国家语言普查时未曾关注和调查的少数民族“空白语言”补充调查，后来改称“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此次调查成果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陆续出版，迄今已出版40多种。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等几十种，其中有些语言是濒危语言。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到 2000 年至 2016 年间以“濒危语言”“语言濒危”为主题的论文就有 573 篇；该网公开发布的以濒危语言为选题的学位论文有 92 篇。自 2000 年以来，我国教育部批准的以“濒危语言”为选题的人文社科项目有 33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有 36 项，总资助金额超过 1200 万元。我们对 2005 年至 2015 年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社科规划办批准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作了粗略统计，选题冠名“濒危语言”的就有 35 项，总金额超过 100 万。虽然无法全部统计各省、自治区教育厅和地方高校自设的濒危语言研究课题数量，但粗略估计，近 15 年来地方政府社科基金和高校自设资金资助的本地濒危语言项目总量不会少于 200 项，总资助金额不会低于 300 万。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出版社也资助濒危语言调查著作出版，国家出版基金也资助相关图书出版，总资助金额保守估计也在百万以上。2015 年国家语委启动国家语言保护工程，其中第一批资助的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濒危汉语方言达到 50 多种，金额超过 600 万。近十多年来，这林林总总各级各类财政支持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和成果出版的资金总量已经超过 3000 万，数据足以说明我国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得到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重视以及实实在在的支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二、关于语言濒危的基本理论问题

语言濒危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为什么会濒危？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常态？

什么是濒危语言，如何认定语言濒危，语言濒危有什么表现，如何评估我国语言濒危现状？



濒危语言要不要扶持或抢救，能不能抢救，或多大程度上值得抢救？怎样才能抢救和保护？

自语言濒危问题受到语言学界关注起，对语言濒危的认识和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濒危语言基本问题认识的持续讨论和争论，有助于建立濒危语言的学说理论体系，但如果反复纠缠于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已有定义、结论和规范的基本理论问题，则会妨碍基本理论的实践运用和检验，不利于理论和思想创新与进步。濒危语言问题的理论探讨，形而上讨论偏多，实践应用和落实显得不足。2004年的广州会议、2005年的南宁会议、2010年的民族语言学会大会、2013年的吉首会议、2014年的玉溪会议都是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会议，这两年一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讨会，仍不乏对上述基本问题的发言，不时有对濒危语言、濒危语言评估这些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所谓重新思考和再认识。

选择濒危语言问题的哪个领域进行思考和研究是研究者的学术权利。濒危语言问题既是语言学研究的课题，又是社会文化问题；前者属于学术权利，后者属于学术的社会责任。正因此，濒危语言的理论必然需要一个规范和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之所以出台《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文件，随后对文件实施作了总结讨论，又于2011年通过了《语言政策指针：语言评估和语言规划的工具（草案）》（下简称《指针》），目的就在于澄清争议、明确目标、确立规范、指导落实。从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群体的情况来看，多数人更专注于濒危语言的语言学描写，而关心濒危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实践的偏少。2010年、2014年，我们曾经在一些民族语言研讨会和暑期班上作了随机访谈，询问过一些研究濒危语言的学者是否仔细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这个文件，结果仅有五六个人表示读过这份文件，许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文件。至于2011年教科文组织专

家会议通过的旨在指导落实的《指针》文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也说明，不少人涉及濒危语言研究，目的恐怕限于将它作为个人语言学的一个增长点，而没有将它作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自觉实践。同时也说明，在一窝蜂大干快上的濒危语言研究中，我国学界对学习和掌握濒危语言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的意识普遍显得淡薄。

### 三、《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文件重要观点阐释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文件是指导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指针和实践指南。文件分五个部分：I.序言；II.背景；III.扶持濒危语言；IV.评估语言濒危状况和记录的紧迫性；V.结语，另外还有一个附件《行动计划建议案》。

文件阐述并明确了语言濒危的原因，以及什么是濒危语言，如何评估语言濒危，要不要扶持濒危语言，如何扶持濒危语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澄清了关于语言濒危的理论争议，明确了基本概念和理论规范。文件确立了评估语言活力和濒危状况的指标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助于避免濒危语言认定的盲目性和主观性。

关于什么是濒危语言，文件给出了定义：“正在走向灭绝的语言即为濒危语言。”

关于濒危语言的表现，文件指出了重要特征：“一旦说某种语言的人不再使用该语言，或用它交流的场合越来越少，或不再将它传给后代，这种语言将面临濒危。这就是说，该语言没有新的使用者，不论成人还是儿童。”

关于语言濒危的原因，文件明确了外因和内因以及内外因的关系：“语言濒危既可能由外部压力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

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原因造成，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和自己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安稳生活，增强社会行动力，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有的探讨濒危语言的著述常常坚持认为，语言接触、双语或多语环境是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文件已有明确的结论：“多语现象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并不必定造成语言消亡。”“使用双语是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生活现实。要保持母语活力，并不一定要求该语言使用者是单语人。”

关于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文件有明确的肯定和阐释：“每种语言都蕴藏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每种语言都独特地表达了人类对世界的体验。”“任何一种语言的知识都可能成为解答人类未来重大问题的钥匙。每消亡一种语言，我们认识人类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模式，了解人类史前史，理解世界多样化生态系统维系的证据就会减少。”“生命多样性包含自然、文化和语言多样性。”

关于要不要抢救或保护濒危语言，文件的态度立场也十分明确：“每种语言都蕴藏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已经无法保持、延续或恢复活力的语言，也仍然值得我们对它尽可能进行完整地记录。这是因为，每种语言都蕴涵了独特的文化知识和生态知识，而且每种语言本身也各不相同。记录这些语言的重要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它丰富了人类的智力财富；它展现了一种对现有知识而言可能是全新的文化视野；记录过程往往能帮助语言使用者重新激活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关于多大程度去抢救或保护，如何去保护，文件提出了几个

明确的方向和实施途径：“扶持濒危语言”“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群体”“积极参加教育计划”“确立少数民族语言在当代的重要作用，使它适应族群内部和国内外现代生活的要求”。

文件还指明了濒危语言记录和抢救的行动路线、政策和措施，对成员国政府、社会组织和团体、语言学者和专家明确在濒危语言的研究、抢救与保护工作中的责任和任务，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份文件除了确立了上述有关濒危语言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规范之外，还体现了以下原则和精神：

1. 明确了永久保持语言多样性原则。

文件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立了永久保持语言多样性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当代的语言政策必须有利于语言多样性的保持和发展。在经济一体化、城镇化、工业化的当代背景下，多民族国家要构建和睦稳定的社会，就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扶持弱小民族和族群，实现共同发展。保持语言多样性，就是要坚持语言平等，让各种语言，不论大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享有同等生存和发展机会。因此，在当代形势下，要制定切实的政策和措施，尊重和维护弱势族群的母语权利。母语权是当代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应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尊重和维护各民族和族群的母语权，首先应正确处理推广国家共同语和保持使用民族语的关系，以及推广普通话和使用方言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迄今不少社会领域的母语权还缺乏有效保障。少数民族母语教学教育在走向萎缩，有的民族地区双语制的落实往往不到位，母语教育沦为一两节“参观展示课”。在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流向城镇企业工业区的现实情况下，少数民族青少年、儿童的素质教育、语言教育和文化服务，既缺乏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也缺乏有效的措施和实践。就汉语方言来说，地域方言在萎缩，而语言政策和规划、学校教学、大众媒体普遍

限制方言使用。这些都不利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和发展。

## 2. 强调了专家学者对濒危语言社群的责任和义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文件，阐述了语言专家和学者在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中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多数专家学者进行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只为了创造自己的研究成果，鲜有人将这项调查研究工作视为一种为濒危语言社区的语言文化服务，是一种为研究而研究、唯自己的研究而研究，这种对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很难产生社会效益。为什么调查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濒危语言能为语言社群带来什么利益；研究成果对语言社群是否有用，是否方便他们使用；除了调查记录濒危语言，外来专家学者能为语言社群做些什么服务？从语言学界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似乎多数人并不关心和考虑这些问题。值得称道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阐述。文件指出，外来专家除了把濒危语言调查记录作为重要任务外，还要积极参加语言社群的教育计划；要为满足语言社群的需求提供帮助服务。例如，帮助当地语文教师提高语言教学技能，帮助当地编写语文学习教材或辅导资料；为语言社群培训和培养本土语言文字人才；为地方政府改进当地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提供建议；关注语言社群的生活和健康状况，成为政府和语言社群沟通的桥梁，促成政府对这些小群体给予关注和扶持。国内语言学界有一种“看似有理”的观点：语言学者你就应该做语言学者该做的事，好好做你自己的学问，不要管其他的事。问题在于，对于濒危语言，什么是语言学者该做的事，什么是其他的事？相信不少人并没有“自知之明”。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是不是写一部“濒危××语研究”或写几篇“濒危××语语音研究”“濒危××语词汇研究”“濒危××语语法研究”之类的语言研究论文就是语言学者该做的事？

从教科文组织文件精神可以看出，这种看似习以为常或貌似

有理的观点并不正确。学术的本质是学与术的融会，学以致用。梁启超先生说：“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学术必须有学有术，它是理论与应用的结合。对于濒危语言社群来说，正因为它的弱小才往往被边缘化，正因为被边缘化，才导致走向濒危。语言濒危背后实际上是文化的濒危，是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多方面的条件环境的不足和衰退，因而需要外来专家的全面关注、扶持和服务，需要语言学家去努力做一些其他相关的服务，这绝对不是不务正业。

### 3. 确立了可操作的语言濒危评估指标。

对濒危语言的科学认定，关系到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调查、记录、抢救或保护，如何取得实效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1 世纪之初召集国际专家专门研讨和制定濒危语言的评估指标并形成了文件，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审议批准，这是极富远见的。2003 年，我国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先生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专家会议，2011 年又参加了文件实施 8 年的总结研讨以及第二份《指针》文件的讨论和审议。这说明教科文组织制定有关濒危语言问题的文件，考虑和兼顾到了世界各国实际状况，因而不能轻率地说它是外国人制定、不符合我国语言国情而加以拒绝。这个文件理应当成为我国濒危语言评估的参考标准。2005 年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濒危语言研讨会上，我们印发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文件中译本。会上孙宏开先生提出了我国应对语言濒危的两条工作思路：保存路线和保护路线。后来他又按照教科文组织文件的评估指标，拟定了一个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名单，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sup>①</sup>（下简称《排序》）一文于 2006 年公开发表。

十多年过去了，我国有哪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方言濒危，哪

---

<sup>①</sup>原文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些汉语方言濒危，濒危程度如何，哪些需要尽快进行抢救记录，怎样抢救记录，如何保护和利用记录资源，这些问题迄今仍存在不少盲点和空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0 年发布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sup>①</sup> 显示，我国有 144 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属于濒危的 51 种，严重濒危的 20 种，极度濒危的 24 种，另有 9 种语言在当代已灭绝。这个名单与孙宏开先生上文的数据差异较大，原因有两个：一是教科文组织编制濒危语言地图时所采用的中国语言分类数据来源不一样，而且采取了宽松做法，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方言纳入濒危语言名录；二是评估等级采用的数据（例如使用人口）并非全部是编制地图时的实际数据，不少是 20 世纪 80 年代数据。上面提到孙宏开先生的《排序》只是一篇论文，篇幅所限，它提供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信息比较简略。对我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土语，在当时乃至现在仍然没有建立一个类似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民族语》（*Ethnologue*）这样详细的语言基本情况名录。汉语濒危方言也缺乏《排序》类似的名单。这也难怪教科文组织主要采用《民族语》数据来编制濒危语言电子地图。

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方言列入濒危名录，那么汉语濒危方言，是否也应列入名录？如何平衡濒危语言和濒危方言的认定和排序？濒危语言或方言的认定看来不只是语言专家个人和小群体行为，而是一种公共行为。哪些语言和方言属于濒危，优先进入名录，应在政府、社会和语言社群之间取得共识，为社会认可和接受。因此，按照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制定一个具体的、有说服力的、规范的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名单，广而告之，由公众评议也好，于普及语言保护政策知识也好，都是必要的。

---

<sup>①</sup> 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

#### 四、《语言政策指针：语言评估和语言规划的工具》 评述

《语言政策指针：语言评估和语言规划的工具》（以下简称《指针》）是2011年5月30日—6月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召开的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形成的报告。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应对濒危语言问题的“三实”精神：实践、实用、实效。各国专家就本国在使用《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以下简称《活力》）文件时遇到的新现象、新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指针》，目的在于指导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社会机构、语言学家如何采取实用而且富有实效的实践政策和措施，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

《指针》总体上注重“实”，但也就《活力》文件中未能注意的理论问题细节进行了补充阐述，使得相关理论原则和规范更加周密和科学。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进一步完善了评估指标概念内涵和外延及术语定义。

关于语言传承的代际问题。《活力》在语言传承评估指标中只定义了“祖辈、父辈、子辈、孙辈”这样的家族谱系的单向代际语言传承。实际上，语言的传承不一定就是由祖到孙这样的纵向传承，孙辈也可能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母语，也可以影响父辈和祖辈。也就是说，语言的传承方向是可以“倒传”的，子女可以教父母语言，祖辈为了与孙辈亲昵关系，也可以学习孙辈的语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语言族群存在两种语言（例如一种口语和一种手语），而这两种语言分属不同年龄群体的时候（青少年知道手语，中老年不知道；青少年也知道口语。手语的传承可以是逆向传承），显然就不能从父母传给子女这种单向的代际传承来衡量语言的传承。这就是说，这项指标除了代际传承之外，还应包括年龄群，人们可能从其他同年龄群的族群成员中



学习和传承母语。

关于语言使用人口和语言能力。《活力》第二、三项指标比较笼统，操作起来不好把握。一种语言的活力与它的语言人口规模密切相关，但是究竟多少人数才算或者才可能走向濒危？语言人口指标虽然很难划定一个具体的“临界点数目”，但设立参考数量也是必要的。实际上运用《活力》进行濒危语言评估时，往往是人数指标不好把握。对此，《指针》提出了一个等级数目，比如0~99、100~999、1000~9999，等等。同时也指出，在运用语言人口指标时，需要评估语言人口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和语言族群的压力程度，因为两种语言拥有同样数量的语言人口，但并不等于语言活力一样，因为语言人口只是表象，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的语言是否娴熟、是否频繁使用和有效地交际使用，所以《指针》指出：“评估一个人能说哪些语言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说哪些语言，比起统计一种语言的绝对使用人数，更有说服力。”因此，这项指标还需补充语言使用能力、频率和效率。

语言人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指针》提出了分级思想，但对如何设定数量等级基数并没有规定，需要各地根据情况作出设定。就我国情况而言，汉族人口基数较大，而少数民族人口基数较低，因此濒危方言的人口基数等级设定就比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人口基数设定要宽松。但同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这些周边国家的少数民族相比较，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基数显然又高于这些国家。如何设定这样的语言人口基数呢？我们曾提出以最基层的行政区划平均人口为参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语言人口的数量分级，再根据这个人口数量等级采用“对数倒数法”得出评估计量分值。<sup>①</sup>这种测定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较高的有效

---

<sup>①</sup>参见范俊军、李义祝《彝语阿扎话的语言活力评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